

政爭太多削弱優勢 「有商有量」推動政改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張學修

谷歌(Google)放棄香港是商業行為，政改是法律與政治問題，二者看似毫無關連，其實不然。本港社會持續日久的政治爭拗，無形中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優勢，令國際投資者卻步。踏入2014年，國際政經形勢波譎雲詭，周邊地區奮發有為，香港社會若不能同心同德，為經濟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被邊緣化看來是難以避免。冀望各界能以香港的繁榮穩定及市民福祉為依歸，在《基本法》基礎上，理性務實「有商有量」，全力推動政改向前行。

香港泛政治化 削弱競爭優勢

不久前，在紛擾的政治爭拗之中，筆者見到這樣一則新聞：谷歌放棄建設香港數據中心，將重點發展台灣與新加坡。記得兩年前，作為全球網絡搜尋器龍頭的谷歌於將軍澳工業村承批2.7公頃土地，並高調舉行動土禮，宣佈投資3億美元興建數據中心，作為發展亞洲市場的基地。本港的網絡建設、供電效能與穩定性等硬件都較鄰近地區優勝，谷歌欲拓展亞太市場，香港是不二之選。可兩年過去了，谷歌一直任由該塊土地荒蕪長草，如今更棄港轉投星台。谷歌亞太區公關經理表示，放棄香港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高昂，以及難以找到大幅土地建設數據中心。這兩個理由能否站得

住腳，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且不論谷歌財雄勢大，就算其在新加坡的數據中心投資僅1.2億美元，相比之下規模小很多，卻依然運作如常。

谷歌事件令港人心理蒙上巨大的陰影，又有傳言稱蘋果公司擬於香港興建海外首個數據中心也泡湯了，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競爭優勢因政治環境趨差而削弱是不爭的事實，是全社會都必須正視的事實。各界若仍未能建立起危機意識，香港前途堪憂。

凝聚中間聲音 爭取政改共識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後在官邸舉行四場政改晚宴，與政改「五步曲」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立法會議員在零壓

力環境下坦誠交流。雖然我們不能指望單靠晚宴就能達成共識，但對增強政府與立法會間的互信，確實有裨益。據林太表示，各黨派分歧仍大，距離共識甚遠。但筆者認為，大家也毋須過分悲觀，雖然反對派拋出「三軌方案」，但其內部對如何演繹態度迥異，溫和反對派擋住「人力」、社民連等激進人士的攻擊，堅拒「三軌」缺一不可這種幼稚、毫無轉圜餘地的做法，留下商討空間，為通過政改方案帶來一線曙光。

談及「三軌方案」，「公民提名」與「政黨提名」為提委會設立前置程序，令提委會淪為橡皮圖章，削弱實質提名權，不合《基本法》規定，當然無討論的需要。筆者相信，激進反對派發起「佔領中環」作威脅，堅持三軌缺一不可，這種意圖撕裂社會，將香港推向暴亂邊緣的激進行為，勢必受到市民的唾棄。香港不想承受普選落空，理性務實討論政改是應有的態度。本人非常贊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說法：要以相關法律為基礎，排拒極端意見，凝聚中間聲音，如此，才有機會凝聚共識，邁向普選。

以《基本法》為基礎 有商有量互相妥協

不久前，「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以個人名義提出普選特首方案，採取二段式提名設計，任何合資格者

只要獲得30名提委會成員支持，就可以成為「準」候選人，包括反對派；之後再經提委會以全票制，選出3名正式候選人；最後交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筆者認為，該方案頗有可取之處，因其能保證不同政見人士都有機會參選。若社會各界在遵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前提下，能進一步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程序、候選人數目、普選安排等事宜展開具體討論，以港人的政治智慧，相信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還是樂觀的。

各界同努力 齊心做實事

香港乃多元社會，有不同聲音很正常。只是，各界若有心落實普選，就必須尊重政治現實，包括《基本法》以及中央的憲制地位，保持克制，保持妥協的空間，以求同存異之心，互諒互讓之原則，務實進取之態度，以民意為依歸達成政改共識，為了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同努力，做實事。

余若薇要做誰的臣民？

徐庶

余若薇發表《公民與臣民》的文章，在「港獨」分子衝擊軍營的問題上，發洩對中國主權的不滿，並且對《基本法》23條的立法採取了反對的態度。余若薇說，「《基本法》除了第23條，還有第22、25、26、39、45、68條，承諾中央不預備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並稱中央對普選的承諾「貨不對辦」，表示23條大可不必執行。

對於《基本法》，余若薇採取斷章取義的歪曲態度。普選問題，基本法45條講得很清楚，就是「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這句說話的意思乃循序漸進，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推進民主。《基本法》有規定，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2005年反對派在立法會否決了政改方案，造成阻礙民主發展的局勢，責任全在反對派，怎麼能怪責中央？《基本法》45條又強調，「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但是，反對派今天又對抗45條，搞了一個憲制文件所沒有的「公民提名」，又要舉行「佔領中環」的暴力行動，蓄意扼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又怎能說成是「中央不兌現行政長官普選的承諾」？

公民黨的前身，就是《基本法》45條關注組，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45條的條文。現在余若薇不打自招，說明了他們關注45條的目標是什麼。余若薇公然說：「我們是公民，不是臣民、順民、草民、暴民」，「我們的使命不是為了獲得權力，而是為了約束權力」。這樣就解釋了為什麼公民黨凡是《基本法》規定的就反對。《基本法》23條關於國家主權和安全，他們反對；有關普選行政長官的《基本法》45條他們也反對。因為普選行政長官，中央有主權，有任命權，有處理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權力，而且會落實43、48條「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這對反對中國主權的搗亂和暴亂分子非常不利。公民黨前主席梁家傑在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就拋出香港「民族自決」論、「高度自決」論，叫嚷要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2005年4月6日，梁家傑在立法會上說，回歸至今「見到的事實是香港只由一個英國殖民地變成一個中國殖民地。」同年9月19日他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演講，竭力鼓吹「香港獨立」，說香港移交中國之後，「香港已經消失」。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將香港重新放回地圖上」。

在英國人管治香港的時候，高度專權，香港人根本沒有民主，余若薇和梁家傑根本沒有走上街頭要求約束總督的權力，他們卻沒有說要「佔領中環」，更沒有說要反對「英王制誥」，更加沒有說「我不做英國的臣民」。余若薇今天的表態，「要做公民，不做臣民」，這恰好說明，她要做的是「英國的臣民」，要復辟殖民帝國的勢力；她不要做中國的公民，不肯遵守《基本法》的義務，說明她要配合外國勢力，反對中國落實主權、國家安全，她愛的是什麼國？所以，余若薇與衝擊軍營的「港獨」分子惺惺相惜。「去中國化」，做洋臣民，乃余若薇的自供狀。

安倍踩美紅線成另一陳水扁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東張西望

到日本訪問的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會晤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時，罕有地說出不利安倍政權的話，要求日本改善因

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而導致惡化的日中、日韓關係。事實上，奧巴馬政府對安倍之不滿已寫在臉上，但是如今的安倍冥頑不靈，就像當年的陳水扁，是亞太地區的「麻煩製造者」。安倍要造反，為太平洋戰爭翻案，擾亂美國亞太格局，再不老實，老美不會坐視不理。

美不容安倍攪亂再平衡策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前不久簽署了參眾兩院通過的涉及慰安婦問題的2014財年支出法案，根據這一決議，美方敦促日本就二戰期間強迫20萬名慰安婦為日本侵略軍「服務」的行為道歉。此舉是美國首次就慰安婦問題通過法案，也是美國就日本戰爭罪行和戰後國際秩序問題對日本的第一項具體措施。即使是逢場作戲，緩和氣氛，一向袒護日本的美國還是有所改變，邁出逼日本「認罪」的一步，得到中韓的掌聲。

美國開始對日本嚴加看管，壓力明顯增大。由於安倍不斷挑戰中韓底線，中韓與日本原本焦灼的關係又火上澆油，這其實是給美國增添麻煩。本來，在日本拜鬼問題上，美國幾十年來一直隻眼睜眼，但最近表態由失望轉為較為強硬的要求安倍不要再參拜，繼而要在慰安婦的問題上通過立法逼安倍認罪，都是出於擔心安倍搞右翼的小動作，影響了美國在亞太的佈局戰略，顯示美國對日本又利用又制衡的兩手政策有了調整。從前美國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就像年輕的媽媽對一個初生的孩子，只要孩子不過分淘氣，媽媽就只會輕說幾句，如「表示失望」之類，做批評自家孩子給別人看看的表面文章。隨着孩子長大，逆反心理漸強，甚至想擺脫母親管制，自己說了算，美國當媽的怎可看孩子「不乖」，還傷了自家韓國兄弟，當然要出來喝止，豈容日本挑戰家規。



■安倍已成亞太地區的「麻煩製造者」，美國不會坐視不理。圖為美國參議員魯比奧訪問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點頭哈腰讓其就坐。

美國的利益不能毀在安倍手裡，不容許安倍攪亂美國再平衡策略。美國要求安倍主動和韓國對話，解決慰安婦問題，是先解決自己兄弟的矛盾，一致對外。其次美國要求日本緩和與鄰國關係，不言而喻是指與中國的關係，是要保證中日沒有衝突，先是無需美國勞民傷財援助日本，再是保證美國在亞太的最大利益對華貿易，以及朝核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的配合，而要得到中國的配合，也需要在約束安倍右傾路線滿足中國的部分要求。

美擔心安倍失控

惹怒美國的，還有日本要「逐美」自立門戶的右傾野心。當下，美國已意識到安倍踩紅線了，直接挑戰美國主導的二戰後國際新秩序。安倍在右傾的路上愈走愈遠，最後必然要擺脫美國的控制。安倍宣稱修改和平憲法為歷史使命，最終使日本成為沒有外國軍隊的正常國家，因此美國亦將要撤出日本，這和美國想進一步擴大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以成為亞太的軍事中心的戰略背道而馳，不符合美國利益。

近年來日本快速提升軍事能力，更是引起美方關注。華府很矛盾，一邊希望日本具備先進軍事能力，輔佐美國重返亞太，但同樣擔心，日本自身的強大會弱化了美國的影響力。或許安倍感受到了三方壓力，此次伯恩斯訪日就推進行動將沖繩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至邊野古計劃達成了一致。日本政府不顧民意反對，亦要為美軍獻上一塊更大的基地，亦是伴君如伴虎。安倍當下是避免如同前首相鳩山那樣明確反對美國駐軍日本，但是其「歷史使命」，最終是「逐美」。

二戰後，日本對美國俯首帖耳，美國給他撻腰沒少得罪其他國家，如今安倍卻要造反，為太平洋戰爭翻案，擾亂美國亞太格局，再不老實，老美還是會像拿下鳩山一樣拿下安倍。

工時要求可稍寬鬆

顏汶羽

觀塘區議員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

行政長官公佈了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主要集中幫助基層市民，在社福政策方面着墨甚多，體現特首聽取民意、對許多社會訴求作出承諾。筆者想集中就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一站式申請福利服務提出意見。

現時香港有不少基層家庭為非綜援計劃的低收入在職家庭。社會雖有法定最低工資，但有些家庭因撫養人數較多而工作人數較少，令生活及經濟擔子沉重，特別是有兒童或在學青年的家庭。施政報告提出每年動用約三十億元補貼低收入家庭，為他們提供適當援助，鼓勵持續就業，建立第二個安全網。這項政策不僅是扶貧措施，同時亦能促進社會基層向上流動，協助部分人脫離在職貧窮，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

但就計劃的初步構想中，對申請者的工時要求，筆者認為是過於嚴苛。受惠家庭需要兩人或以上，至少一人在職，而當局將視乎有關在職人士的工作時數和家庭收入，每月發放300元至1,000元不等的基本津貼，另每名合資格兒童或青年可額外獲發每月400元或800元津貼，而計劃更不設居港年期要求，政府估計超過20萬戶低收入在職家庭共71萬人受惠，其中18萬是合資格兒童或青年。工時要求方面，申請人每月工時是208小時以上，每月獲發全額基本津貼1,000元；若每月工時是144小時至少於208小時，每月基本津貼只為600元。每月工作208小時，即每星期工作52小時，這與近年政府和社會一直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是相違背的。工時要求變相為基層勞工提高經濟誘因去多工作，變相減少了與家人共聚的时光。

其次，現時市民如需申請不同福利計劃須向個別部門遞交，手續繁複，令市民不便。例如綜援、生果金便要跑到社會福利署，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便要到勞工處。施政報告中提到將聘請顧問研究設立一站式便民服務的可行性，便是一項利民的新措施。筆者認為政府應盡快實施此服務以改善市民申請不同津貼福利的情況，令更多基層市民受惠。

李因才 上海社科院國際關係研究所

泰國「顏色」亂局根在何處？

泰國曼谷街頭的「黃衫軍」反政府抗議活動已持續多日。隨着暴力的升級和信心的喪失，泰國眼下的局勢正趨於惡化。儘管英祿政府一再示弱，不尋求武力鎮壓，還同意解散國會、重新大選，與反對派共商國是，但「黃衫軍」依然不依不饒，街頭運動領導人素貼曾表示，「封鎖曼谷」行動將一直持續到看守政府下台、推選大選、全面改革的訴求得到滿足。為達成心願，反對派甚至表示「需要做點違法的事，以實現目標。」

泰國陷入政治怪圈

泰國似乎陷入了一種政治怪圈：選舉出來的政府始終被當作一部分人的政府，失落的一部分人則尋求體制外抗爭，直到迫使政府倒台。雙方惡鬥得死去活來，國家則陷入周期性動盪。選舉變得毫無威信，可憐兮兮的如皮球一般，被兩派踢來踢去。

自2006年開始，街頭政治這種無序的政治參與方式就先後拉倒了四屆政府。一次通過軍事政變方式，兩次通過溫和的憲制政變方式，由憲法法院出手迫使沙馬和頌猜在不足三個月間相繼下台。而阿披實則是在「紅衫軍」的壓力下通過大選體面下台。由於屢試不爽，三次示威結果都讓參與者心滿意足，且不受任何懲罰。因此，比起漫長艱苦的體制內鬥爭，這種高效率的方式更樂意被不同派別採用。

他信成了泰國揮之不去的陰影。儘管流亡在外已經5年多，但圍繞他信的政治鬥爭依然火力不

減。在近十年的五屆政府裡，他信及其勢力組織了其中的四屆。反對派則只在台上兩年半，掌控了一屆政府。由於通過大選方式實現上台掌權的體制內途徑堵塞，反他信勢力自然選擇了街頭政治。不過，街頭政治的無序不僅無助於紓解泰國目前的政治僵局，反而可能將其拋入無盡的暴力深淵，從而誘導軍方再次出手。

很多評論將泰國目前的政治僵局歸結為經濟層面的衝突，認為該國劇烈分化的貧富差距導致兩派角力不斷。經濟原因固然是泰國社會分裂的深層次原因，但很難解釋街頭政治的盛行和民選政府的輪番倒台。在筆者看來，泰國系列政治危機的更重要原因，在於泰國民主制度的虛弱無力。

自1932年確立立憲君主制至今，泰國雖已走過70餘年民主歷程，但由於不斷遭受軍事政變的挫敗，致使泰國的政治發展既沒有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那樣建立起穩固的威權體制，也沒有像菲律賓和印尼那樣在民主化之後建立起穩定的民主政體，而是在動盪和軍事政變中來回搖擺於軍事威權、半民主和民主政體之間。軍隊的強勢地位使其超越民主政體之上，以自治的政治監護者自居。

不僅如此，由於泰王的尊榮地位，民眾的效忠對象既可指向泰王，也可指向民選政府，完全視哪方能滿足自我利益。一旦民選政府試圖脫離傳統政治運行的軌道，努力尋求建立唯一的權威中心，正如他信政府那樣，就必然造成傳統和現代這樣兩種不同政治組織原則之間的對決，而不同勢力在各自背後的搖擺助威，勢必會撕裂族群，造成社會信任機制的急速流失。

可以想見，在如此雙重強權勢力的夾擊下，民選政府肯定處境尷尬，難以確立威信。這樣一方面，當民眾權利意識覺醒，要求影響政治議程後，虛弱的民主制度無以提供有效順暢權威的制度化參與途徑，由此間接導致體制外街頭運動的興起。

泰國須強化政府威信和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當出現突發事件時，政府也無法單獨應對。由於缺乏強力後盾，民選政府隨時要看泰王和軍方的臉色。因而，很容易轉化為軍事政變後的三屆政府在示威群眾面前都顯得瞻前顧後，猶疑不決，沙馬和頌猜任內兩次宣佈實施緊急狀態，最後都無果而終，只待束手就擒；也很容易解釋在「黃衫軍」和「紅衫軍」面前，數量龐大的警察為何形同虛設，以致一再上演類似包圍國會、總理府、佔據機場、衝擊東亞峰會會場這樣的事件。

在泰國政治轉型的關鍵時期，亟需社會各界共同維護既有制度，而其中，精英人士責任尤其重大。不過，坦率地講，泰國政治精英往往圖謀私利，表現讓人失望。在政治鬥爭過程中，他們一再情緒化地鼓勵民眾街頭抗爭，甚至不顧後果鼓吹革命、政變，致使暴力不斷升級，社會裂痕日益加深。與此同時，議會被拋在一邊，政府無人問津，法治遭到踐踏，社會陷入失序狀態。

要走出當前困境，泰國必須強化其政府威信和自主能力。否則，這個美麗的國家還將沉溺於此種「自殘式」的瘋狂「顏色」角逐中難以自拔。